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外学生朋辈协同育人的实践考察与问题审视——基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亚洲校园”计划的个案分析

廖思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DOI:10.32629/mef.v9i9.22171

[摘　要] 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背景下,中外学生“同校不同群”的社交隔离现象较为突出,削弱国际化育人实施成效。本文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东方学研究院)“亚洲校园”计划为个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中日韩学生课程嵌入、活动驱动、日常浸润三类朋辈互动实践,剖析朋辈互动由浅层交往迈向深层育人的内在逻辑,梳理该项目的育人成效与现实结构性局限。本研究可为涉外院系开展国际化思政育人、推进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提供个案经验参照。
[关键词] 文明互鉴；朋辈协同育人；趋同化管理；中日韩学生互动；亚洲校园
中图分类号：G548.9　文献标识码：A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e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Campus Asia” Program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isi Li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vergenc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segreg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same school, different groups”—is prominent, weak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ized education. Taking the “Campus Asia” Program of the Faculty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s a case,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amine three types of peer interaction practices: curriculum embedding, activity-driven interaction, and daily immersion.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through which peer interaction advances from shallow contact to deep educational engagement, and reviews the program’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real structural limitation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case-based reference for foreign-related faculties and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iz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Key words]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pe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nvergence management; interactions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Campus Asia

引言

随着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持续推进,破解中外学生社交隔离、实现文明互鉴式育人,已成为高校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中外学生朋辈协同育人,能够依托平等的青年交往,把跨文化接触转化为育人资源。本文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亚洲校园”计划为个案,考察中日韩学生朋辈互动实践,剖析其育人成效与现实局限,为涉外院校完善国际化育人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1 理论基础、研究现状与政策背景

1.1文明互鉴：跨文化朋辈育人的理论内核

文明互鉴作为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内涵,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包容共生、互学互鉴,摒弃传统文明等级与中心边缘叙事,将文化差异视为对话发展的优质资源。吴海江指出,文明交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流互鉴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内在逻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教育层面的理论支撑[1]。这一理念落实到高校育人场景,意味着思政教育需要跳出单向灌输模式,转向多元文明主体之间的双向对话。宋梦想进一步提出,文明互鉴的教育转化需要从简单的文化展示走向价值共鸣,依靠具体育人载体实现理念下沉[2]。换言之,文明互鉴不能停留于原则性倡导,而必须嵌入可操作的实践机制。对外语院系而言,中外学生的日常交往提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条件,如何将语言交流和文化接触转化为价值引导的资源,是文明互鉴理念落实到高校育人实践的关键命题。

1.2朋辈协同育人的理论内涵与既有研究反思

朋辈教育(Peer Education)依托同龄群体的身份语境与情感联结,更容易实现理念共情与行为示范。朱平在 “三全育人”体系研究中指出,高校育人体系普遍存在育人主体协同虚化问题,各主体间的职责壁垒制约整体育人实效[3]。这一问题同样体现在传统来华留学生管理当中：传统管理范式偏向规训管控,中外学生之间的日常交往往往被视作管理事务,而非可以开发利用的育人资源,学生间互动未能纳入整体育人体系,也缺少对应的价值引导。郑晓娜、翟文豹提出,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破除主体间信息壁垒,构建环环相扣的责任网络[4]。同时,谭鸿予等人结合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进一步拓展协同育人内涵,强调通过理念、平台、制度多维度协同,同步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5]。相较传统管理模式,朋辈协同育人范式重在挖掘学生主体之间的互动潜能,依靠平等对话、互助协作与情感联结完成价值内化。但现有成果大多集中于师生、校院管理主体的协同层面,中外学生双向朋辈互动怎样转化为实际育人效能,仍缺少扎实的个案实证挖掘。

1.3趋同化管理政策导向与中外学生融合现实困境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推进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强调中外学生教学、管理、服务标准统一,同时指出趋同化不等于等同化,需要兼顾文化差异、促进中外学生交流理解[6]。然而,许多高校的留学生管理依然存在物理与社交层面的“二元分区”,中外学生的课堂和活动空间相互割裂,融合育人机制流于形式。王小青等的研究认为,趋同化管理的难点不在于制度条文的统一,而在于打破中外学生群体之间的社交隔离,创造常态化的融合场景[7]。这一结论在东亚来华留学生群体中更为突出：中日韩学生文化亲缘度高,看似更容易交流,但隐性的历史认知和社会观念差异反而容易造成浅交流、深隔阂。因此,趋同化管理不能止步于统一管理规定,还需要依托朋辈互动搭建柔性的跨文化对话载体。

2 广外日语学院(东方学研究院)中日韩学生互动实践考察

2.1实践场域：“亚洲校园”计划的制度基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东方学研究院)“亚洲校园”项目自2012年启动,联合日本立命馆大学、韩国东西大学实施“1+1+1”跨国流动培养模式,学生先后在三国校园共同修读课程、开展课题研讨,形成常态化的中日韩学生共居共学场域。该项目区别于短期交换项目,学生需共同完成课程研讨、田野调研、文化展演等任务,为朋辈协同育人提供了高密度、持续性的互动场景[8]。中日韩三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文字、民俗、思想传统存在同源性,但近代发展路径差异显著,构成了“同源异流”的独特文化语境,这既降低了跨文化沟通的门槛,也为相互镜鉴、理性对话提供了条件。

2.2互动形态：三类朋辈协同实践

依据互动的制度嵌入程度、内容结构程度和学生自主程度,可将“亚洲校园”计划中的朋辈互动归纳为课程嵌入型、活动驱动型和日常浸润型三种类型。

课程嵌入型互动是制度化育人的核心载体。项目专属的CAP多语言交流课程,打破传统语言课堂单向教学模式,将中日韩学生混合分组,围绕社会文化、青年发展、区域治理等多元现实话题开展多语言自主研讨。课程由不同国籍学生轮流担任话题引导者,实现学习者、分享者、引导者身份动态转换。在跨国流动学习阶段,三国学生共同参与国别社会研究、东亚文化比较等专题课程,主动将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转化为课堂研讨的多元视角资源,推动育人过程从被动知识学习向主动思维碰撞转变,为文明深度对话搭建标准化结构化框架。

活动驱动型互动是制度化育人的有效延伸,以学生自主策划、协同落地的主题活动为核心载体。亚洲校园文化节、多语外语角、跨国研学实践等品牌活动,全程由三国学生协同策划、分工实施、统筹推进,在任务协作中打破国别陌生壁垒、建立稳定协作信任。学院组织的广西黄姚古镇中华文化研学活动中,中日韩学生通过合宿调研、文化体验、成果共创等深度互动模式,沉浸式感知中华文化底蕴、交流各国文化特色,形成了弱制度约束、高情感联结的优质互动场景,充分释放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

日常浸润型互动是跨文化理解的隐性核心场域。在跨国流动学习期间,三国学生同校求学、同住宿舍、共参校园生活,共餐交流、课后闲谈、学业互助等常态化日常互动,构建起自然松弛的跨文化交往空间。相近的东亚交往礼仪与社交逻辑,有效降低了非语言沟通障碍,让学生在自发性、生活化的交往中规避刻意交流的生硬感,潜移默化实现文化认知互通,逐步形成超越单一国别身份的青年交往共同体。

三类互动形态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朋辈协同实践体系。课程嵌入型互动提供了制度化的接触机会和结构化的交流框架,是朋辈协同的起点和基础;活动驱动型互动拓展了互动的场景和内容,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日常浸润型互动则将跨文化交往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使文化理解从“有意识的学习”转化为“无意识的习得”。三类互动的有效衔接和相互支撑,构成了广外亚洲校园朋辈协同育人的完整实践图景。

2.3协同机制：朋辈互动的四重育人维度

上述三类互动实践之所以能够产生超越一般“交流活动”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的育人效果，关键在于朋辈互动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深层的转化。这些转化可以从认知、情感、能力和认同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认知维度实现从碎片化文化知识到整体性文化理解的转变。在传统的跨文化教育中，学生获取的是关于他国文化的对象化知识，而在朋辈协同实践中，文化知识通过与他者的直接互动转化为切身的理解。以中日茶文化比较活动为例，中日韩学生在“佳乐庵”茶室中不仅了解了日本茶道的器具和历史，更在与中国茶文化的对比中认识到中国茶文化在亚洲地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学生不再机械记忆文化符号，而是通过面对面深度交流，厘清不同文化的形成背景、发展逻辑与价值内核，塑造多元包容、理性客观的跨文化思维。

情感维度的核心是从功能性同学关系到持续性朋辈情谊的转变。制度化的课程学习、项目合作具备明确的任务属性，关系偏向功能性、暂时性。而长期高频的共学共居生活，让学生在共同应对语言障碍、文化适应、学业压力的过程中相互扶持、彼此包容，逐步建立真挚稳固的跨国朋辈情感。这种情谊具备长效性，并未随学业结束而消散，毕业生自发组织的跨国线上交流会，印证了朋辈情感的延续价值，形成了可持续的跨国青年人际交流网络。

能力维度实现从单一语言技能到综合跨文化素养的转变。“亚洲校园”计划以“中+日+韩+英”四语复合和“语言技能+区域国别知识”双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但语言能力的提升只是能力产出的起点。更重要的能力产出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常态化的跨文化对话、观点碰撞、异议表达、团队共创，有效锤炼了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冲突调适、多元思辨能力，帮助学生打破单一文化视角局限，培育适配新时代国际化发展的综合核心素养。

认同维度的关键是从“单一文化认同”到“多元文化理解”的转变。参与项目的学生在多国流动学习中，直观感知东亚文化的同源性与多样性，能够正视文化差异、尊重文明多元，摒弃非此即彼的片面认知。在深度理解他国文明的同时，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刻，文化自信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平等互鉴、包容共生的文明观。需要说明的是，该维度成效主要来源于学生主观体验，属于阶段性观察结论，仍需长期追踪验证。

3 实践成效与局限

经过十余年深耕，广外“亚洲校园”计划构建了成熟完善的中日韩学生朋辈协同育人体系，育人成效获得行业与学界广泛认可。人才培养层面，项目培养的学生兼具多语能力、区域国别知识与优质跨文化素养，毕业生升学质量高、就业层次优，广泛就职于涉外企业、国际机构、高端服务领域，国际化综合竞争力得到用人单位充分肯定。育人实践层面，项目打造的共学共居、双向互鉴模式，有效破解了中外学生社交隔离难题，推动来华留学趋同化管理从制度层面的标准统一，升级为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为外语院校国际化思政育人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区域交流层面，项目持续搭建中日韩青年常态化对话平台，以朋辈交往为柔性载体，夯实了东亚文明交流互鉴的民间基础。

4 现实问题及其成因

尽管项目育人成效突出，但受制度设计、个体差异、机制建设等多重因素制约，实践过程中存在显著结构性困境，模式难以直接规模化、普及化复制推广。

首先，精英选拔模式与普及化育人目标存在内在张力。“亚洲校园”计划作为三国政府主导的高端精英人才培养项目，选拔标准严苛、覆盖范围有限，各校每年仅择优选拔20名左右学生参与培养。项目依托高经费投入、小班化教学、专属跨国流动资源实现高质量育人成效，但这种“小规模、高配置、精英化”的培养模式资源门槛极高，无法适配普通高校中外学生大规模融合育人的普惠性需求，经验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受限。

其次，朋辈互动深度受制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个体差异。王勇、蒋一琦、陶维坤在趋同化管理研究中指出，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足制约了深层次全方位趋同化管理的实现[9]。这一判断在“亚洲校园”案例中同样有所体现：虽然课程嵌入型和活动驱动型互动为中日韩学生提供了结构化的交流机会，但互动的深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学生能够借助共享的东亚文化圈背景和相近的交往礼仪迅速建立信任，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因语言能力不足或文化认知差异而停留在浅层交际层面。同时，中日韩三国差异化的历史叙事、社会认知，易形成隐性交往隔阂，导致朋辈互动难以实现全员、全方位、深层次赋能。

最后，长效维系机制缺失，朋辈育人成效易衰减。当前项目朋辈互动高度依托在校期间的课程安排、主题活动、校园生活，互动强度、互动频率与项目周期深度绑定。各类研学、交流活动结束后，学生自发互动频次大幅下降，学院层面尚未建立制度化的校友联动、长效交流、持续赋能机制。现有朋辈育人主要依靠学生自主维系，缺乏常态化引导、系统化规划与持续性保障，导致优质育人成效随学生毕业、学段结束逐步弱化。

上述三个困境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定位矛盾，项目聚焦高端精英人才培养，追求育人质量的“高峰效应”，而高校趋同化管理立足全员普惠育人，追求育人覆盖的“高原效应”，二者定位差异导致精英模式无法简单移植到普通育人场景。二是机制属性矛盾，朋辈互动具备自发性、生活化、碎片化特征，而系统化育人需要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的流程支撑，自发交往的灵活性与育人体系的规范性难以完全适配，制约了朋辈育人核心价值的充分释放。

5 结语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外学生朋辈协同育人，核心要义是打破中外学生二元分割的管理格局，推动制度层面的趋同管理转化为交往层面的文明互鉴，实现来华留学教育从“被动管控”到“主动赋能”的育人转型。广外“亚洲校园”计划的多年实践表明，课程嵌入、活动驱动、日常浸润三类互动形态，能够有效搭建中外学生深度交往、平等对话的优质平台，推动学生在认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知、情感、能力、文明理解层面实现全方位成长，为外语院校国际化育人提供了成熟的实践样本。

同时，本次个案研究也清晰地呈现出精英化涉外育人项目的天然局限，覆盖范围有限、互动深度不均、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是各类高端跨国育人项目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基于此，高校在借鉴相关实践经验时，不应简单照搬精英培养模式，而应提炼可普及、可落地的朋辈育人核心要素，在常规留学生培养体系中，嵌入分层互动、多元对话、长效联动的育人设计，搭建适配普通院系的中外学生朋辈协同育人体系。

本文为单校单项目质性个案研究，研究结论仅适用于同类东亚语种涉外育人场景，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且育人成效以质性观察为主，尚未构建量化评估体系。后续研究可扩大调研样本与覆盖范围，完善育人成效量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朋辈协同育人实施路径，为新时代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外青年文明互鉴育人实践提供更完善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吴海江.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宋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D].湘潭大学,2025.

[3]朱平.高校“三全育人”体系协同与长效机制的建构:以全员育人为中心的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2019(2):96-101.

[4]郑晓娜,翟文豹.高校构建“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59-63.

[5]谭鸿予,孙萍,张亚楠,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高校“三全育人”协同机制优化探析[J].高等建筑教育,2022,31(1):202-212.

[6]中国政府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EB/OL].中国政府网官网,2026年9月14日阅览.

[7]王小青.趋同化管理背景下中外学生社交融合的困境与出路[J].高等教育研究,2023(10):73-80.

[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亚洲校园计划:多国政府共同主导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EB/OL].(2025-06-18).

[9]王勇,蒋一琦,陶维坤.趋同化管理模式下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路径研究[J].公关世界,2024(22).

作者简介：

廖思思(2003--),女,汉族,广东省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与东方学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兼职辅导员。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